

AIGC 时代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嬗变与重构 ——基于《飘》梅静译本与 AI 译本的对比研究

马云龙

(天津外国语大学, 天津, 10068)

摘 要: 生成式人工智能软件对文学翻译的介入引发对译者主体性的重新审视。本研究选取《飘》第一章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比梅静译本与 Deepseek 译本在外貌描写、语言描写及环境描写的翻译策略, 以谢天振创造性叛逆为理论视角, 分析译本在文化传递、语域再现及文学风格重塑上的差异。研究发现: 梅译本具有有意识的审美判断、文化自觉和语域敏感度; 而 AI 译本尽管在语义准确性和流畅度上表现良好, 但在文化意向的深层激活、语域差异的系统性再现以及叙事氛围的整体把握上具有很大的局限。于此, 本研究提出, AIGC 时代, 译者主体性应从执行者角色转换为策展人, 从而让机器翻译在提高人的生产力的同时, 更具人的生命力。

关键词: 创造性叛逆; 译者主体性; AIGC; 文学翻译; 《飘》

基金项目: 天津外国语大学研究生科研立项基金

DOI: doi.org/10.70693/202608301057

1 引言

以 ChatGPT、Deepseek 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迅速发展, 致使文学作品的生成方式、传播路径以及意义结构发生变化 (吴赞, 2026)。文学翻译涉及审美意蕴重构、文化异质性再现, 以及人物性格与情感基调细腻捕捉, “是译者以原文为基础、以文学艺术性为原则的再创作” (党争胜, 陈洁, 2026), 这些都高度依赖译者主体性, 需要译者在理解原文、选择策略、重塑风格时所体现出的文化自觉、审美判断和创造能力。袁筱一 (2026) 指出, 人工智能在创造性、审美在线与文化传达上存在明显不足。

《飘》作为美国南方文学的标志性作品, 其语言兼具叙事典雅、景物精致和方言鲜活的多重层次, 是检验文学翻译质量的理想文本。自 1940 年傅东华首译本问世以来, 学界已从多元系统理论、翻译规范、性别视角、归化异化等角度对多个中译本进行了丰富研究, 但尚无研究将人工译本与 AI 译本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下进行对比。

为此, 本研究选取《飘》第一章英文原文, 对比梅静译本与 DeepSeek 模型在特定提示词引导下生成的 AI 译本, 聚焦于外貌描写、语言描写和环境描写三类典型文本, 从创造性叛逆视角分析两种译本在文化传递、语域再现和风格重塑上的差异, 进而归纳人工译者主体性的具体表征与 AI 译本的固有局限, 从而重构译者主体性。

2 创造性叛逆溯源

“创造性叛逆”由法国社会学家埃斯卡皮创立, 后由日本和美国的学者引介和接受, 又通过跨国、跨语言传播, 为中国比较文学界接受, 最终在翻译学界产生了巨大反响 (梁新军, 2022)。国内发展主要依赖于谢天振先生, 在继承发扬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探索出了属于中国的“译介学”。谢天振肯定了埃斯卡皮的观点, 但认为埃斯卡皮的观点过于浅显, 对其进行了新的发展。他认为“除译者外, 读者和接受环境同样是创造性叛逆的主体” (谢天振, 1992), 扩大了创造性叛逆的研究对象。

作者简介: 马云龙 (2002-), 男, 硕士, 研究方向为英语笔译。

通讯作者: 马云龙

在《译介学》中,谢天振将创造性叛逆分为有意和无意两种,并进一步划分为“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转译与改编”(谢天振,1999)。这意味着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融入自己的个性,对源语文本进行改动、节选甚至忽略,从而使译介体系内各组成部分的含义在目标语文化中产生改变。此后,译界对于创造性叛逆的研究便几乎与译者绑定起来,将译者作为研究创造性叛逆的主要承担者。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语料选择、提示词设计与研究方法等方面遵循了明确的操作规范。

语料来源:英文原文采用1936年麦克米伦公司出版的《飘》初版文本,具体章节为第一章全文,涵盖人物外貌描写、对话语言、环境叙述等多元文体。这三类文本分别对应了文学翻译中不同的主体性诉求:外貌描写考验译者对形象再现的审美判断与语言雕琢能力;语言描写考验译者对语域差异的敏感与再现能力;环境描写考验译者对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氛围营造能力。通过这三组对比,可以较为全面地揭示人工译者与AI在创造性叛逆层面的本质差异,进而为AIGC时代译者主体性的嬗变与重构提供经验参照。梅静译本选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出版的全译本。AI译本则由DeepSeek V3模型生成。

提示词设计:为避免AI翻译的随意性、确保AI译本的质量基准,本研究在启动翻译前向DeepSeek模型输入了明确的角色设定与翻译要求,提示词按照“基础描述+功能约束+风格定义”(吴京等,2025)的要求进行设计。提示词如下:你是资深文学译者,精通19世纪美国南方文学与英中文学翻译。要求:只翻译节选内容,不增删、不改写,忠实原文细节与语气;专有名词首次出现用通行译名,必要时括号保留英文;对话体现人物身份与语域差异,底层人物语言可略朴实,但不用中国方言;保持原文段落结构与标点逻辑,不加注译或译者注;译文风格典雅流畅,有19世纪南方庄园氛围,避免现代词汇和翻译腔。

分析方法:文本细读法,从微观的词语选择、句式安排、修辞再现入手,结合宏观的文化语境与叙事风格,对两种译文进行平行对照。重点考察两种译本在面临相同的原文文化要素与语言难点时所采取的叛逆方式,探寻哪些是有机的创造性转化,哪些是机械的偏离与缺失。

4 文化要点翻译对比

4.1 外貌描写

外貌描写在文学作品中承担着塑造人物形象、暗示性格特征乃至铺垫叙事走向的多重功能。译者面临的核心挑战在于如何在目标语言中再现原文的视觉冲击力,同时传递形象背后隐含的审美判断与文化信息。

例 1

原文: In her face were too sharply blended the delicate features of her mother, a Coast aristocrat of French descent, ...cutting a startling oblique line in her magnolia-white skin-that skin so prized by Southern women and so carefully guarded with bonnets, veils and mittens against hot Georgia suns.

梅译:她的母亲是法国沿海地区的贵族后裔,父亲是面色红润的爱尔兰人。她的脸既有母亲的娇柔精致,也有父亲的深邃粗犷。这种融合虽不甚协调,却也自有迷人之处:下巴尖尖,颌骨宽宽。淡绿色的眼睛不带一丝褐色。浓密的睫毛又黑又直,眼梢微翘。两道又黑又浓的眉毛斜斜上挑,衬着木兰般的白净肌肤,格外显眼。这样的肌肤,南方姑娘们都会十分珍视,万分小心地用遮阳帽、面纱和手套保护起来,免得被佐治亚地烈日晒黑。

AI译:她脸上鲜明地糅合着两种特质:一种是母亲那纤细娇柔的容貌,她母亲是沿海贵族,有着法兰西血统;另一种是父亲那粗犷厚重的轮廓,他父亲是肤色红润的爱尔兰人。但这是一张令人过目难忘的脸,尖尖的下巴,方方的颌骨。她的眼睛是淡绿色的,不带一丝淡褐,眼周镶着粗硬的黑睫毛,眼角微微上翘。那两道浓密的黑眉斜斜地向上挑去,在她那木兰白的肌肤上划出一道醒目的斜线——那种肤色,正是南方女子引以为傲、不惜用遮阳帽、面纱和手套精心护着,以免被佐治亚灼热的日头晒伤的。

分析:AI将too sharply blended译为“鲜明地糅合着”,忠实于字面,但有欧化倾向;梅译将其转化为“虽不甚协调,却也自有迷人之处”,将原文的负面判断转化为一种矛盾统一的美感,体现了译者对人物形象的文学理解。AI将arresting face译为“令人过目难忘”,准确但略显生硬,梅译的“自有迷人之处”则在忠实原意的基础上赋予了译文以中文审美质感,更符合文学翻译的接受语境。

描写肤色时,原文以magnolia-white skin为核心意象,后接长句说明这种肤色在南方文化中的特殊价值。

梅译将 *so prized* 译为“十分珍视”，将 *so carefully guarded* 处理为“万分小心地……保护起来”，并通过“免得被佐治亚地烈日晒黑”这一因果句式，使文化语境自然浮现。AI 译虽然完整保留了信息链，但“引以为傲”与“精心护着”之间缺乏梅译那种从“珍视”到“保护”再到“免受伤害”的递进感，且句子过长，不符合中文习惯。

例 2

原文：On either side of her, the twins lounged easily in their chairs, squinting at ... booted to the knee and thick with saddle muscles... blue coats and mustard-colored breeches, they were as much alike as two bolls of cotton.

梅译：兄弟俩一左一右，慵懒地斜靠在她两边的椅子上，手里各端了个插着薄荷叶的高脚玻璃杯，有说有笑地聊着。阳光透过杯子，晒得他们眯起了眼。两双穿着齐膝高靴的长腿随意交叠着，小腿都因骑马而鼓鼓的。脸庞晒得黝黑，头发深赭色，眼睛神采飞扬、傲气十足。两人穿着相同的蓝上衣和暗黄色马裤，活像两颗一模一样、难以区分的棉桃。

AI 译：她两旁，那对双胞胎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举着高高的加了薄荷叶的玻璃杯，眯着眼迎着阳光，一边笑一边谈。他俩的长腿，靴子长及膝盖，因常年骑马而肌肉结实；晒得黝黑的脸上，深赤褐色的头发，眼神快活而傲慢；身上穿着一样的蓝外套和芥末黄马裤，两人像两朵棉桃似的，几乎一模一样。

分析：*lounged* 一词描述了南方绅士的闲适姿态，梅译以“慵懒地斜靠”搭配“随意交叠着”，赋予了人物以阶层身份与生活方式的暗示；AI 译的“懒洋洋地靠在”虽未出错，却缺少了那种教养与优越感的微妙传达。在 *thick with saddle muscles* 的处理上，AI 通用化处理为“肌肉结实”，可以形容任何运动造成的肌肉；梅译则精确为“因骑马而鼓鼓的”，不仅准确对应了 *saddle* 一词的语义场，也使种植园子弟善骑射的身份通过身体细节自然呈现。

4.2 语言描写

《飘》第一章中的对话描写具有鲜明的社会语言学特征。不同人物的语言反映了其教育程度、社会阶层、地域归属乃至种族身份。其中最典型的是黑人仆从杰姆斯的方言——其拼写变形、语法“错误”和词汇选择共同构建了一种特定的口语语域，是原文叙事声音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不同语言系统中再现这种语域差异，是文学翻译中最能检验译者主体性的环节之一。

例 3

原文：“Nawshu, Ah din' notice y'all say anything ter mek her mad. Look ter me lak she sho glad ter see you an' sho had missed you, an'... Den she quiet down lak a bird w'en de hawk fly ober.”

梅译：“没有啊。我没觉得你们说了什么会惹她生气的話。依我看，她见到你们挺高兴，也很想念你们，叽叽喳喳，跟鸟儿一样快乐。直到你们说阿希礼先生要跟玫兰妮·汉密尔顿小姐结婚了，她才安静下来，变得像只看到头顶有老鹰盘旋的小鸟一样。”

AI 译：“不，先生，我没觉着你们说了啥惹她生气的話。瞧着倒像是她挺高兴见着你们，也挺念着你们的，她叽叽喳喳跟小鸟儿似的快活着呢，后来你们讲起阿什礼先生和梅利·汉密尔顿小姐要成亲的事，她就静下来了，像小鸟见了老鹰飞过似的。”

分析：原文中杰姆斯的方言包含一整套非标准英语特征：首字母脱落、元音变异、语法简化、词汇拼写变形以及特有的感叹词。这些特征建构了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美国南方黑人奴隶的口头表达方式，使其区别于白人角色的标准英语。

面对这一翻译难题，AI 译本放弃了方言特征的任何形式再现，仅保留了“先生”这一称呼，将 *Nawshu* 处理为“不，先生”：这实际上是标准英语的翻译逻辑，而非方言的翻译逻辑。除了“觉着”、“啥”、“鸟儿”等少数口语词汇外，AI 译本的杰姆斯几乎与一个标准英语使用者没有区别。这种处理方式完全消解了原文中方言所承载的社会文化信息：杰姆斯的种族身份、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在译文中变得不可辨识。梅译本则表现出明确的方言再现意识。译者通过一组精心选择的语域标记来重建口语感：“没有啊”开头的语气词、“依我看”的口语化表达、“叽叽喳喳”的拟声叠词、“跟鸟儿一样快乐”与“像只看到头顶有老鹰盘旋的小鸟一样”的明喻再现，用很朴素的语言显示出说话人没有接受过教育，只是在朴素的描述事件。梅译本也未对语法结果做特殊处理，而是进行“标准化”，同时在词汇和修辞层面赋予足够的口语化特征和生动性，使译文读者仍能通过语感辨识出这是一个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黑人仆从的声音。这一策略体现了文学翻译中一种重要的创造性叛逆：当源语言的

特定语言变体在目标语言中缺乏对应的社会语言学对等物时，译者转通过语域的其他维度（语气词、句式、修辞方式）来补偿原文方言的交际功能和文化身份建构功能。这是一种有意识的、策略性的主体性选择。

例 4

原文：“Don't you call Abel Wynder 'po' white.' Sure he's poor, but he ain't trash; and I'm damned if I'll have any man, darky or white, throwing off on him. There ain't a better man in this County, or why else did the Troop elect him lieutenant?”

梅译：“竟敢说埃布尔·温德先生是‘白垃圾’。他的确穷，但绝不是垃圾；任何人，无论黑人还是白人，谁要敢说他坏话，我都不答应。全县没有比他更好的人了，要不骑兵连怎么会选他做少尉？”

AI 译：“你别管阿贝尔·温德叫‘穷白人’。他固然穷，可不是下等货；我可不许谁——不管黑人白人——糟践他。这个县里再没比他更好的人了，不然骑兵队怎么会选他当副队长呢？”

分析：这一例中的核心翻译难点在于 po' white 与 trash 的文化对应。po' white (poor white 的缩写) 是美国南方特定历史语境下的社会阶层标签，指没有土地、没有奴隶的白人贫民，在种植园社会等级中处于底层。trash 则是贬义更强的侮辱性称呼，意指下等人、废物。两个词之间存在语义张力：斯图尔特允许别人说艾布尔“穷” (poor)，但不允许说他是“垃圾” (trash)。

梅译以“白垃圾”对应 po' white，“垃圾”对应 trash，并通过“竟敢说”开头的句子传递了斯图尔特的愤怒语气。这一处理在中文中建立了清晰的语义梯级：“白垃圾”比“穷”更具侮辱性，因此斯图尔特的反驳——“他的确穷，但绝不是垃圾”——在逻辑上成立且有力。AI 译为“穷白人”与“下等货”，在语义对应上没有错误，但“穷白人”在中文中是一个描述性词汇而非侮辱性标签，与“下等货”之间缺乏“同根词”的修辞呼应，削弱了原文中 po' white 与 trash 之间的语义关联。此外，梅译“我都不答应”比 AI 译“我可不许”语气更强、更口语化，更能体现斯图尔特年轻气盛、仗义执言的性格。

4.3 环境描写

环境描写在《飘》第一章中承担着双重功能：一方面构建故事的地理空间与时代氛围，另一方面通过景物描写承载文化与象征意涵。南方种植园的红土地、山茱萸花、原始森林等意象不仅是视觉元素，更与南方的历史记忆、种族身份乃至叙事主题（土地的眷恋与失去）紧密关联。环境描写的翻译因此不仅要求语义的准确，更要求意象的传递和氛围的保留。

例 5

原文：Outside, the late afternoon sun slanted down in the yard, throwing into gleaming brightness the dogwood trees that were solid masses of white blossom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new green.

梅译：屋外，夕阳斜斜地照着院子，把一片新绿中簇簇饱满的白色山茱萸映得闪闪发亮。兄弟俩的马拴在车道上。

AI 译：屋外，午后的斜阳洒进院子，将山茱萸树照得明晃晃的——那一树树密密的白花，衬着新绿的背景，格外耀眼。

分析：late afternoon sun 这一时间状语，AI 译为“午后的斜阳”存在不准确之处——“午后的”在中文中通常指向正午过后不久，而 late afternoon 更接近“傍晚”，梅译的“夕阳”更为精准。这是一个细节性失误，但恰好暴露了 AI 在时间语义精确性上的局限。

例 6

原文：Spring had come early that year, ... far-off bloody glory of the sunset colored the fresh-cut furrows of red Georgia clay to even redder hues. The moist hungry earth, waiting upturned for the cotton seeds, showed pinkish on the sandy tops of furrows, vermilion and scarlet and maroon where shadows lay along the sides of the trenches.

梅译：这年春天来得早。下了一场温暖的阵雨，大片粉红桃花和星星点点的雪白山茱萸便骤然绽放，把幽暗的河沼和远处的群山点缀得花团锦簇。春耕已近尾声，夕阳血红的余晖也把佐治亚红土地上新开出的犁沟映得更红了。湿润的泥土饥肠辘辘、嗷嗷待哺，等着播下棉花种子。犁沟的沙顶粉粉的，畦沟两侧的阴影处却既有朱红，也有绯红，还有紫红。

AI 译：那一年春天来得早，暖和的急雨骤然而至，粉红的桃花忽然间繁花满树，山茱萸点缀着暗色的河沼和远处的山峦，如白星点点。春耕已近尾声，落日那血红的壮丽光彩，将新翻的佐治亚红土垄沟染得愈加殷红。

湿润而饥渴的泥土，翻敞着等待棉籽播下，垄沟顶端的沙土透着粉红，而沟侧的阴影里则泛着朱红、猩红和栗色。

分析：这一例中，AI 译本的语义完整性和流畅度较高，“繁花满树”、“白星点点”、“血红的壮丽光彩”此类表达都达到了不错的文学水准。然而，梅译本在某些关键节点体现了更深层的文化自觉与审美判断。

在 the bloody glory of the sunset ... to even redder hues 一句中，AI 译文准确传达了语义，但“红土垄沟染得愈加殷红”中，“染”字暗示外部色彩对土垄的作用，被动意味较强。梅译“映”字更强调光与土之间的交互关系，且“新开出的犁沟”比“新翻的土垄沟”更具有动态的时间感，暗示春耕正在进行中，与后文“等着播下棉花种子”形成更紧密的衔接。在色彩词的处理上，原文末尾连续呈现了 pinkish、vermilion、scarlet、maroon 四个层次，描绘夕阳投射在犁沟不同部位所产生的细微色差。AI 译“透着粉红”、“泛着朱红、猩红和栗色”，以“透着”与“泛着”分别对应顶端的明亮与沟侧的阴影，逻辑清晰。梅译“粉粉的，畦沟两侧的阴影处却既有朱红，也有绯红，还有紫红”，以“阴影处”为逻辑引导词，并用“既有……也有……还有……”的排比句式，将四种颜色的并列呈现转化为一种逐步展开的视觉勘探，使译文读者仿佛跟随叙事者的目光从垄顶移向沟侧，获得了更强的画面沉浸感。

例 7

原文：It was a savagely red land, blood-colored after rains, brick dust in droughts, the best cotton land in the world. ...Be careful! Be careful! We had you once. We can take you back again.

梅译：这是片红得耀眼的土地，雨后更是红得像血，旱时如砖尘遍地，……沙沙作响的松树仿佛已耐心地等待了很久，用轻柔的叹息威胁道：“小心！小心！你们曾经属于我们，现在我们能将你们收回。”

AI 译：那是一片蛮荒的红土地，雨后如血，旱时似砖尘，是世界上最好的棉田。……那飒飒低吟的松树，仿佛怀着亘古的耐心在等待，用轻柔的叹息发出警告：“当心！当心！我们曾拥有过你。我们还能再将你夺回去。”

分析：这是《飘》第一章环境描写中最具文学性和象征意味的段落。savagely red land 开篇定调。savagely 一词兼具“蛮荒”、“凶猛”与“原始”的多重意涵，暗示了这片土地美丽背后的暴烈历史。AI 译“蛮荒的红土地”精准捕捉了核心语义，梅译“红得耀眼的土地”则在字面忠实上有所偏离，但“耀眼”一词呼应了后文 blood-colored、brick dust 的视觉冲击力。这两种处理各有千秋，AI 在词义准确性上胜出，梅译在语感连贯性上占优。

两种译本最大的差异出现在段末的警告部分。原文以拟人化的松树口吻发出威胁，这句话指向南方种植园的历史，是一种关于殖民、占有与历史循环的深沉隐喻。AI 译文的“拥有过”暗示一种温和的占有关系，“夺回去”中的“回去”二字使方向明确指向“重返此前状态”。梅译的“属于我们”比“拥有过你”更具主体与客体的层级关系，更准确地对应了 we had you 中 had 一词在 19 世纪南方语境中所隐含的主奴关系张力；“将你们收回”比“夺回去”更贴近 take you back 的语义，且“收回”一词在中文中适用于土地等非生命物，比“夺回去”更为贴切。

更值得关注的是整体氛围的传递。AI 译“略带阴森”、“发出警告”，虽然语义准确，但在语体上偏于说明性，将森林拟人化的威胁直接陈述为“警告”。梅译“带着几分不祥”、“用轻柔的叹息威胁道”，将森林的态度从直接的“警告”转化为一种幽微的、弥漫的“不祥”感，更符合原文 a little sinister 与 soft sighs 所营造的神秘而克制的恐怖氛围。梅译在“叹息”之后保留了原文的引文格式，“小心！小心！”的重复和感叹号，使拟人化的威胁获得了直接的听觉感，比 AI 译的转述式“发出警告”更具文学感染力。

5 分析与重构

5.1 译者主体性差异分析

基于上述三类文本的对比分析，可归纳梅静译本的主体性特征与 AI 译本的固有局限。

梅译本的主体性特征主要包括：一，梅译在文化负载词与意象传递中表现出明确的文化传递意识，无论是南方肤色审美观的强化，还是“白垃圾”这一阶层标签的精准对应，均非语义层面的简单对译，而是在跨文化传递与本土接受间的有意权衡。二，在形象再现与氛围营造中，梅译不被动追随原文字面顺序，而通过词汇选择、句式调整与修辞强化主动介入，赋予译文独立审美价值。三，方言对话处理中，梅译借语气词、口语化表达与修辞方式补偿中文无法直译英语方言语法变异的空缺，以语域补偿语域策略，体现译者对社会语言学结构

的高度敏感与创造性应对。四，面对人物心理、叙事态度与象征性威胁，梅译不仅传递信息，更通过语调把控传达原文的情感温度与叙事姿态。

AI 译本的局限主要体现在：一，表层忠实与深层扁平的悖论，AI 译文在绝大多数词句层面实现语义对应与语法通顺，个别片段甚至展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措辞能力，但面对需要审美判断与文化背景填充的文学性表达时，往往选择最常规、中性的处理路径，致使语义完整但文学质感与文化深度减损。二，文化知识碎片化严重，AI 在处理语义梯级时未能建立修辞呼应，在处理主奴关系暗示时选择温和化表达，这表明其文化知识虽广却缺乏系统性，难以在具体语境中激活深层历史文化图式。三，缺乏情感判断与叙事姿态。AI 倾向于将一切叙述材料等量齐观地翻译为信息，难以识别叙事中的温度点。面对方言、口语与标准英语的变体光谱，AI 的默认策略是将非标准形式统一为规范中文，虽保证可读性，却牺牲了原文的社会语言学结构；面对复杂修辞，也倾向选择最简单直接的表达路径，而非主动强化或重组修辞效果。

5.2 成因分析与主体性重构

两类译本在主体性层面的差异，根植于知识结构、认知方式与价值立场三重结构性因素。

知识结构上，梅静作为文学译者，其储备不仅包括语言能力，更涵盖 19 世纪美国南方历史、种植园文化、种族关系及中文文学表达传统的长期浸润，能够根据原文的语言风格有意识地适配历史语境（崔峰，2024）。AI 的知识虽广，却在文学翻译所需的语境化知识层面呈现碎片化，所进行的分析也只是统计学计算过后的产物，包含了无意义联结内容（仲伟合，2026）。认知方式上，人类翻译是理解—阐释—表达的连续过程，译者进入原文文学世界后，基于对人物心理、叙事姿态、场景氛围的理解进行有意识的强化、淡化或转化。价值立场上，梅静具有明确的文化中介者身份意识，对原文文化内涵与目标读者理解体验负有双重责任感，这驱动她在翻译中主动阐释、补偿与调适。AI 则无对谁负责的主体意识，其翻译仅为文本序列生成任务，而非跨文化交际实践。

上述差异为 AIGC 时代译者主体性的重构提供了逻辑起点。传统译者的角色是“文本执行者”。当 AI 能承担大部分忠实转换工作时，译者正转向“翻译策展人”：不再从零制作每一展品，而是在 AI 初译基础上判断、修改、润色，在多方方案间比较择优，在文化难点处深度补偿，在整体层面把控文学品质与跨文化效果。

据此可提出一个主体性重构的基本框架：横轴为技术介入程度：全人工—AI 辅助—AI 主导—全 AI，纵轴为译者主体性维度：语言转换—文化阐释—审美判断—策略决策。传统人工译者位于横轴最左端，纵轴各维度全面发挥；AI 全自动翻译位于最右端，各维度能力趋于浅层匹配；而理想的人机协同译者位于中部偏右，但在纵轴上向高端移动——放弃底层的语言转换劳动，将核心精力集中于文化阐释、审美判断与策略决策。这并非主体性的削弱，而是向更高维度的迁移。

对实践而言，这意味着一套新工作范式的形成：译者将 AI 视为“译稿起草者”，在 AI 初译基础上进行系统性人工干预，在质量检验阶段由人类译者主导（李俊德，2026）。这既要求译者保有传统语言功底与文学素养，也要求其掌握提示词设计、输出评估、人机交互优化等新协作技能，也需对人机协同的认知过程、质量标准与伦理边界展开更深入的探索。

6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飘》第一章梅静中译本与 DeepSeek AI 译本的文本细读与平行对比，揭示了文学翻译中人类译者与 AI 在主体性层面的本质差异。研究发现，AI 在基础语义转换层面已具备较高准确性与效率，但在涉及审美判断、文化意象传递、方言社会身份编码及叙事氛围整体建构等核心维度上，其概率性生成机制无法替代人类译者的意向性阐释过程。

这一差异的理论实质在于：创造性叛逆的本质并非语言的任意变形，而是以文化自觉和语境敏感为前提的有意图的阐释性转化。人工译者的“偏离”是文化中介者的主动调适，而 AI 的“偏离”是非意图性的统计产物。将创造性叛逆的分析视野拓展至 AI 译文后，本文更清晰地界定了“创造性”在文学翻译中的边界。它植根于译者对源语文化的理解深度与对译入语文学传统的驾驭能力，而这恰恰是目前大语言模型难以跨越的认知鸿沟。

基于上述发现，本研究提出，AI 时代文学译者的主体性不应在技术冲击下退却，而应实现从“语言转换执行者”向“翻译质量策展人”的转型，从而让 AI 译本更具有人的生命力和审美。在人机协同成为行业常态的背景下，译者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强化机器所匮乏的文化阐释、审美判断与语境敏感能力。唯有如此，文学翻译

才能在技术洪流中守住其艺术品格。未来研究也可进一步扩大语料规模,引入更多译本类型进行横向比较,亦可通过翻译质量评估量表对机译文进行量化分析,以深化对 AIGC 时代文学翻译规律的认识。

参考文献:

- [1] 吴赞. 文本的异质性与文化的可译性: AIGC 语境下文学翻译的新挑战[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6, 65(3): 148-158.
- [2] 党争胜, 陈洁. 人译还是机译? 文学作品翻译的独特性再思考[J]. 中国翻译, 2026, 47(3): 123-132.
- [3] 袁筱一. 人工智能与文学翻译批评原则的再思考[J]. 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 2026, (1): 1-13.
- [4] 梁新军. “创造性叛逆”的跨国旅行与内涵变迁——对比较文学译介学一个经典术语的考察[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2, 45(01): 95-102.
- [5] 谢天振. 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2(1): 30-37.
- [6] 谢天振. 译介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 [7] 吴京, 王沈策, 牛虹苏. 基于提示词优化的 AIGC 辅助产品设计方法研究[J]. 包装工程, 2025, 46(16): 186-201.
- [8] 崔峰, 彭嘉馨. 《三国演义》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翻译与传播——以曾锦文峇峇译本中的创造性叛逆为例[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4, 47(5): 69-81.
- [9] 仲伟合, 陈严春. 生成式人工智能汉英翻译实践的幻觉及其纾解路径[J]. 中国翻译, 2026, 47(2): 130-137.
- [10] 李德俊. 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对译者任务的再思考[J]. 外语学刊, 2026, (1): 7-14.

The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ranslator Subjectivity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the AIGC Er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ei Jing's Translation

and an AI Translation of *Gone with the Wind*

Ma Yunlong

Tianjin Foreign Study University, Tianjin, China

Abstract: The involvement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has prompted a re-examination of translator subjectivity. This study selects Chapter One of *Gone with the Wind* as its research object. By comparing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used in Mei Jing's translation and the DeepSeek translation in rendering descriptions of appearance, speech, and environment, and by adopting Xie Tianzhen's theory of creative treason as it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translations in cultural transmission, register reproduction, and the reshaping of literary style. The study finds that Mei's translation displays conscious aesthetic judgment, cultural awareness, and register sensitivity. By contrast, although the AI translation performs well in semantic accuracy and fluency, it shows significant limitations in deeply activating cultural imagery, systematically reproducing register differences, and grasping the overall narrative atmosphere. On this basis, the study proposes that in the AIGC era, translator subjectivity should shift from the role of executor to that of curator, so that machine translation can enhance human productivity while being endowed with greater human vitality.

Keywords: creative treason; translator subjectivity; AIGC; literary translation; *Gone with the Wind*